



葉靈鳳（1905-1975）

中國現代著名作家、畫家、編輯家、翻譯家、藏書家。本名葉蘊璞，1905年生於南京，後加入創造社，曾擔任多種文藝刊物之編寫工作，主編多份報刊副刊，1930年代擔任上海現代書局總編輯。獨具一格的小說和作品使他成為海派文學的代表作家。抗日戰爭時期來港，先後編輯《立報》《星島日報》副刊，後來長期主編《星島日報》文藝副刊《星座》，居港期間，書寫香港的山川草木，開創香港研究先河，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

◎ 許迪鏘

葉靈鳳文壇交遊紀略

霜紅室中人與事

2025年是葉靈鳳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去世五十週年紀念，香港三聯書店出版《葉靈鳳文存》，第一卷《霜紅室隨筆·藝海書林》於五月面世，為這特殊的日子獻上別饒意義的花束。

葉靈鳳由1958年起在《新晚報》撰寫「霜紅室隨筆」專欄，到1969年停筆，前後十一年，計有二千多篇文章，內容包羅廣泛，而最受讀者歡迎的，還是其中有關閱讀的文字，這構成了羅孚先生主編的

三冊《讀書隨筆》的主幹。《葉靈鳳文存》之《霜紅室隨筆》分門別類，選輯專欄的精華，率先出版的《藝海書林》二冊，是先生的「老本行」——文藝閱讀隨筆，然後是《歲月留情》，寫對故人和香港的情愫，接下來是《博聞廣識》和《鄉關何處》，分別寫日常生活中各種名物不為人熟知的知識，以及對故國與故鄉的思念。其中所選，之前多未曾結集，且以編年為序，可說是為葉靈鳳生平和精神面貌展開

一軸新的長卷，為認識葉靈鳳其人其文提供新的線索。讀《霜紅室隨筆》，可以有不同的切入點，書籍版本、文壇舊聞、藝術賞析、物事源流，故其犖犖者，我讀來感受最深的一點，是從裏面所提到的作家和人物，可窺探葉靈鳳的為人，他與這些文人之間複雜的關係，以及他們所不為人知的一面。這裏抽選其中若干位，略加表述。

小夥計與「三頭馬車」

郁達夫（1896-1945）、郭沫若（1892-1978）、成仿吾（1897-1984）是創造社的「三頭馬車」。葉靈鳳 1925 年加入創造社，這年他二十歲，故自稱為創造社的「小夥計」。但這小夥計做的工作相當多，他們為求建立自己的發行權，不受發行商剝削，並享有出版自由，以公開招股的方式成立了「創造出版部」，以五元為一股，很快便籌集到超乎預想的資金，這也許是最早的「眾籌」。

在「三頭馬車」中，葉靈鳳最早認識的是成仿吾。那是在 1924 年前後，葉靈鳳仍在美術學校上課，初嘗試寫作，「將剛寫好的幾篇散文，附了一封寫給仿吾先生的信，親自送了去。……他正是一位泰山北斗一樣的人物，我當時不過二十歲，自然沒有勇氣，也沒有這奢望，敢去拜見

當時叱咤文壇的這位人物，因此只將那封信放在他們後門的信箱裏，就急急的走了。」（1959 年 1 月 7 日〈寒夜懷人〉，《霜紅室隨筆·歲月留情》，即將出版）過了兩三天，有人往他家裏送了一張便條，請他過去創造社會面，下面的簽名，赫然是成仿吾。不消說，葉靈鳳「就懷著一顆突突跳著的年輕的心，急急的去拜訪他」，他走進了創造社的大門，走進了五光十色，也危機四伏的文學世界。

成仿吾相當嚴肅，郭沫若倒比較多言，與年輕人較為親近。葉靈鳳對他則甚尊敬，每稱郭老而不名，後來他回憶起創造社時期，還記錄有這麼幾段文字：「（郭沫若）每天下午自己拖了根木屐上小菜場去買小菜，賣菜的人叫他『太司務』（即伙頭之意，因為從前上海很少男子到菜市去買菜的，因此認為他是外國人家裏的大司務），他回來同我們談起這事，十分高興，箕踞在樓下客廳的籐椅上，笑得嘻開了嘴。」另一次過年前後的聚會中，大家喝了點酒，興致很高，就玩起擲骰子的遊戲：「郭老每擲下一把骰子，在碗裏轉動著還不曾停下之際，他往往會焦急的喚著所希望的點數。若是果然如他所喚的那樣，就興奮的用手向坐在一旁的人肩上亂拍。我那晚恰坐在他的身邊，因此被打得最多。」（1965 年 5 月 1 日〈《洪水》和出版部的誕生〉，《藝海書林》下冊，頁



葉靈鳳喜讀郁達夫的舊體詩

484) 這種被「打」，應該是使這小夥計感到幸福的。

葉靈鳳視郭沫若和成仿吾為師，與郁達夫則是「義兼師友」，對郁達夫的作品，「在感情上是無保留的」喜歡，但郁達夫和王映霞女士的戀情，不但在社會上引起了非議，也在郁達夫和「小夥計」之間產生了芥蒂：「我們尤其對他與王映霞女士的戀愛，發生了反感，因而鬧出了一些感情上的衝突。」（1962年8月16日〈讀《郁達夫詩詞抄》〉，《藝海書林》上冊，頁238）至於郁達夫方面，對這些小夥計一點也不支持體諒他的態度，也極為反感，而且反應強烈。葉靈鳳說：「就為了王女士，（郁達夫）曾經斥我同當時幾個其他年輕的朋友為『喪盡天良的下一代』，說我們應該鑄成一排鐵像跪在他的床前。」（1963年2月22日〈題郁達夫《日記九種》〉，《藝海書林》下冊，

頁319）用詞不可謂不嚴厲。雖然後來二人「和解」了，葉靈鳳寫信向郁達夫道歉，郁達夫也回信表示「決不感有甚麼怨恨」，「而我也已途窮日暮，豈肯因你一言，而作小孩子般的賭氣之事」，但葉靈鳳始終認為，郁達夫若不與王女士戀愛而又隨後反目，就決不會出走南洋，導致最後的悲慘結局。郁達夫的文學創作生命過早結束，葉靈鳳「覺得這乃是中國文壇的一項重大的損失，也正是我們對於義兼師友的郁達夫先生，每想起了就要覺得心痛的原因」。

短暫的舞台生涯

葉靈鳳參加過兩次話劇演出工作，因他是學美術的，擔負的都是舞台裝置和佈景。一次是1938年他由廣州南下香港前夕，為夏衍寫的獨幕劇《贖罪》當舞台裝置，由他畫草圖給木工搭製，還負責處理音響效果。有一幕劇中角色要按門鈴，葉靈鳳想到以鬧鐘聲權充門鈴聲，演出時效果很好，令他甚感得意。另一次是「很久很久」以前（1920年代後期），他參加朱穰丞主持的辛酉劇社，演一齣叫《桃花源》的戲。這齣戲需要一幅很大的桃花作為背景，傾幾個人之力畫了幾天，但最終效果卻不大理想。

舞台設計也好，佈景師甚至音響師

也好，有成功也有失敗，雖然最終沒有把葉靈鳳帶進戲劇工作，但他除了與田漢有交往外，與著名的劇作家歐陽予倩也有過交往，至於朱穰丞（1901-1943）則較少提及。

朱穰丞出生於上海，是「中國話劇運動早期開路人之一」（1960年10月19日〈我的舞台工作〉，《藝海書林》上冊，頁105），主持辛酉劇社，推動「難劇運動」，要求藝術的完美。朱穰丞出身富戶，父親是實業家，未到二十歲便應父親要求出社會做事，並結婚生子。富裕的家境並沒有窒礙朱穰丞對理想的追求，他加入左翼劇團聯盟（後改名左翼戲劇家聯盟），隨後赴法國留學，並加入共產黨。因推動反帝運動，被逐出境，1933年抵莫斯科，1939年以間諜罪入獄，1943年死於西伯利亞勞改營。葉靈鳳對這位家境優裕卻拋妻棄子參加革命而致犧牲的故人，一直念念不忘，雖然他所知的細節不多，只知道他「早已結了婚，而且有了好幾個孩子。後來忽然單身一人到蘇聯去研究戲劇，從此就不曾再回來過。有一年我同（袁）牧之談起他，牧之說有人從歐洲回來，曾見過他，他早已到了歐洲，參加了一個馬戲團的工作」。在夏衍的記述中，「（朱穰丞）1936年在蘇聯『大清洗』運動中失蹤，從此就和國內（包括他的妻子）斷絕了消息。……到1955年，袁

牧之才含著眼淚告訴我，朱穰丞在1936年蘇聯肅反時失蹤，肯定已不在人世」。（《懶尋舊夢錄》，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頁116）

網上有資料說，1989年1月16日，原蘇聯「最高蘇維埃」恢復了朱穰丞的名譽。

聶耳的耳朵

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者聶耳（1912-1935），原名聶守信，雲南人，避難東京時在一次晨泳中不幸溺斃。聶守信有一「特異功能」，就是兩隻耳朵可以分別自由抽動，葉靈鳳說他因此改名聶耳。他追述當年情景：

我是有這光榮，曾經一再見過他表演這有趣的小節目的。大約在一九三二年前後，有一時期，我在上海差不多每天同田漢先生在一起。老大的身邊照例總是有一大堆朋友跟著的，因為他實在具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這裏面有一個便是聶耳。有時，老大為了要寫劇本，在法租界邊上那些較清靜的旅館裏開了一個房間，大家聞風而至，聚在一起高談闊論，或是浩浩蕩蕩的到大世界附近的小館子裏去吃晚飯，只要有人說一句：「聶耳，動一動耳朵給我們看看」，他就會很正經的坐著，雙手撐著膝頭，兩隻耳朵不知怎樣的就會一動一

動的動了起來。他表演得很正經，有時還會一面做鬼臉，使得大家一時都輕鬆起來。

多麼有趣的耳朵，可惜只抽動了二十三年。（1959年7月17日〈聶耳和他的耳朵〉，《霜紅室隨筆·歲月留情》，即將出版）

賣碑帖老頭的畢生影響

葉靈鳳就讀的教會中學，校舍在山上，學生都要寄宿，每月只能下山兩次。學校特別許可一些小販每星期六來校販賣食品、書籍和文具等，其中有一兩個山東老頭，整個學期只來一兩次，只賣碑帖。「他們的主顧不多，可是凡是同他們有過交易的，總是渴望著他們的來到」，葉靈鳳就是他們中的一員。兩個山東老頭的其中一個，介紹葉靈鳳買《龍門十二品》，葉靈鳳說魏碑字體沒清道人寫的那麼漂亮，老頭說，「清道人所寫的是今體，碑上的字體才是古體」。許多年後，葉靈鳳才明白老頭的見地，也就難怪在字體上還是讓勤抄魏碑的魯迅獨步了。另一次，老頭送給他一張「墨片」，說：「這是武梁祠，賣剩的。有點意思，送給您罷。」由那時起，葉靈鳳才認識武梁祠這個名字，由此愛上了漢魏畫像磚的拓本，進而喜歡石刻，如昭陵八駿，再進而喜歡現代木刻、版畫。葉靈鳳著名的「鳳凰藏書

票」中的那隻鳳凰和周邊裝飾圖案就出自漢磚。他足與魯迅並駕的對木刻運動的推動，可以說就源於許久以前與山東老頭的那一次交易。（1963年4月24日〈黑老虎的老師〉，《霜紅室隨筆·歲月留情》，即將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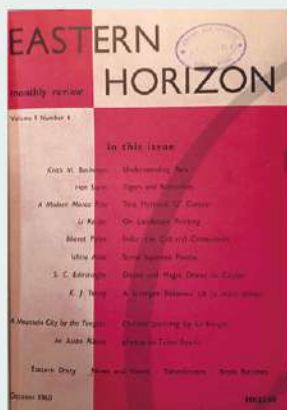


武梁祠畫像磚拓本

最沉痛的悼念

葉靈鳳在香港定居後，結交了另一批新朋友，如陳君葆、劉芃如、黃雯（醫生，毛澤東詩詞英譯者）等。其中又與劉芃如（1921-1962）最為深交。劉芃如是香港知名文化人劉天梅、劉天蘭、劉天均的父親。據《葉靈鳳日記》盧瑋鑾箋：「（劉芃如）在四川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到倫敦大學研究英國文學。1949年回國時途經香港，加入《大公報》當翻譯，後轉任英文月刊《東方地平線》總編輯。」劉芃如

筆名「洪膺」，與葉靈鳳在《新晚報》是「同文」，而且中英文俱佳，編《東方地平線》（*Eastern Horizon*）時每期以英文撰寫〈*Eastern Diary*〉（香港日記）專欄，就新中國的發展和世界形勢向國際讀者發聲。可惜1962年7月應邀參加阿聯建國十週年紀念，在飛往開羅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劉芃如主編的《東方地平線》第1期封面，1962年

劉芃如應是極少數能與葉靈鳳談西方文學的友人之一，他的去世對葉靈鳳無疑是重大打擊，葉靈鳳在7月23日寫下〈一篇不忍下筆的文章〉，是《霜紅室隨筆》所有悼念文字中最沉痛的；第二年7月20日又寫下〈逝者如斯夫：紀念芃如逝世一週年〉，隱痛猶在。劉芃如太太1974年攜兒女移居加拿大，朋友為她餞行，但葉靈鳳「託故未去」，只由太太趙克臻一人出席，怕的是「觸動感情」，蓋「芃如因墮機罹難已十多年了，我至今還忘不掉這個朋友」。（2月11日《日記》）

結語

儘管本文所提到的的人物，只是《霜紅室隨筆》裏的極少一部分，但仍可見葉靈鳳「交遊廣闊」，興趣也相當廣泛，字裏行間，同時觀照時局、世態、人情。但縱觀他的一生，還是以上海時期更為精彩。他寫小說、辦雜誌、畫插圖、做設計，都卓然有成，所結交的、結怨的也往往是當代「文豪」。單就藏書票來說，他與日本乃至全球的藏書票愛好者都建立了聯繫，在上海也有不少志同道合者。有人從海派作家傅彥長1933年8月9日的日記中找到一段：「在葉靈鳳寓所，閱Ex-Libis。同在一室者有巴金、林徽因、施蛰存、杜衡。」多麼亮麗的一張名單。相對來說，他在香港的生活便平靜得多，為了養家，他把全副精力用在編輯和寫作上，他買了很多書，也讀了很多書，主要還是為了從書本中找寫作素材。當然，我們會為他慶幸，儘管留在香港未必是他的意願，但到底讓他度過了一個安穩的晚年。

許迪鏘

作家、編輯。從事編輯工作多年，公餘參與《大拇指》雜誌、素葉出版社出版文學書刊。著有《南村集》《形勢比人強》等，編有《盧瑋鑾文編年選輯》《葉靈鳳文存》。

速成時代， 閱讀終究「擱淺」？

◎ 呂大樂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客席研究講座教授，曾任教於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著作包括《隨便讀》《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模式》《四代香港人》等。亦為報刊專欄作者，現文章定期見於《明報》。

香港的實用化閱讀基因

曾幾何時，本地書店暢銷書榜上排在最前面的，一直是香港地圖。電子地圖、GPS 在那個時代還未出現，更沒有具備導航功能的應用程序，在生活、工作等不同場景，很多人都需要有一本地圖。我不清楚當年地圖的銷量，所以難以評價所謂暢銷是什麼概念——它們的暢銷，可能只反映出其他書籍的讀者更少，而它們的受歡迎，只是相對而言罷了。當然，也不能排除地圖確實有一定的銷量，而且經常有購買新版的需要，如此這般，它們長期在暢銷榜上居高不下，也有其合理的解釋。地圖有價有市，皆因它們實用。在香港，有用、實用很受重視；實用與否，決定了很多人的選擇。

香港文化是實用一派，由來已久，

根深柢固。但將「有用」這個框框套在閱讀之上，甚至以一種工具主義的方式來進行閱讀，則教育界多多少少要負上一定的責任。雖然種種教學的手段令青年學生讀書的數量有所增加，可是享受閱讀過程的年輕人卻也有所減少。

據說閱讀能提升學生的中英文能



作者呂大樂與其藏書的合影

力，於是很多年輕人為了中文和英文科可以考到好成績而閱讀。當然，多閱讀肯定可以提高讀者的語文能力，這是效果之一，但由於學生是為了應試而讀，他們對閱讀本身的興趣，則往往相當有限。在香港，失去對閱讀的內在興趣和追求，並不會被視為一個問題。重要的是，有閱讀記錄的學生增加了，而當中很多學生也提升了語文能力。用香港常用語來表達，大家「收貨」，不一定是因為滿意，但至少是可以接受。

在實用論進一步擴展之下，學校常用「工作紙」來輔助學生閱讀。本來這樣的學習材料有其作用，可幫助一些學生不至於毫無頭緒，難以掌握文本的主題。在適當的輔助下，學生更容易投入閱讀，產生興趣，日後自主展開閱讀。但在普遍使用「工作紙」之後，很多學生便先了解它的題目，然後從閱讀材料中尋找適當的答案。從此閱讀理解演變成一個「找找看」的遊戲，閱讀效率——即以最短時間找到「標準答案」是一種受重視的學習能力。由於速度、效率、準確性等有助於學生在考試、測驗中取得更高的分數，於是培養高效的閱讀法（及回應「工作紙」的技巧）至關重要。

在我看來，這差不多等於將閱讀本末倒置了。我們逐漸以最工具主義的方式來接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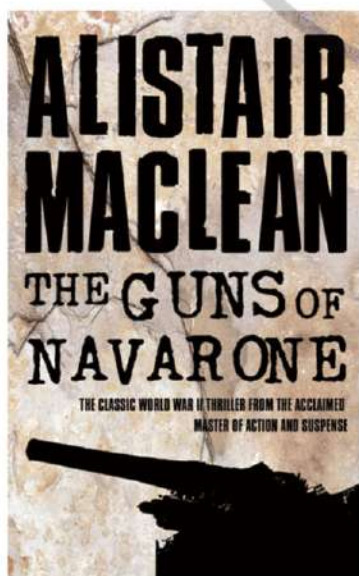
從《金銀島》到《飄》

我應該屬於一個晚熟的讀者。小學階段我不常閱讀。老師推薦冰心的《寄小讀者》，但對我來說實在太悶了，讀不下去。到中學，中一至中四（聖誕節前），學業成績可謂一塌糊塗。不過，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發現《金銀島》（*Treasure Island*）的故事很有趣，於是全本讀完。及後在閱讀課堂上讀到《湯姆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完全被精彩的情節吸引，因此也主動讀了下去。所以，雖然當時成績欠佳，但我沒有懷疑過自己的閱讀能力，只要找到感興趣的書便去讀。不過，當年會考（決定能否繼續升學及於兩年後參加考取大學入學資格的公開試）時，卻沒有讀過一本參考書。會考放榜後，我曾到中西區一名校報名，也許是因為兩門歷史課的成績還可以，所以得到了面試的機會。面試老師的其中一個問題是：試講出一兩本歷史參考書的書名，並解釋它們有何值得參考的地方。我竟然只能講出西史的教科書和中史的一本「會考必讀」，那位老師眉頭一皺，我便知道應該沒有錄取的機會了。

令我開始主動甚至努力尋找書籍來閱讀的轉折點，是一本故事書——*The Guns of Navarone*。它是中五班的

英文閱讀書本，大概是負責教學的神父發覺我們這批男孩子對文學名著沒有什麼興趣，於是選了這本由名作家阿利斯泰爾·麥克林所寫，曾經拍成電影的二戰驚險小說，帶領我們讀出趣味。麥克林的小說不易讀，當初大家在「捱」過開頭三十頁的時候，難以適應那種場景描寫和敘述方式。但經神父提點之後，便逐漸能夠掌握故事的情節和發展。一經過那個轉折點之後，同學們就開始以自己的節奏閱讀，人人想知道故事進一步如何發展，想較其他人更早明白為何故事中的人物能夠克服困難，最後完成任務。

從此，很多同學都開始對閱讀小說產生興趣。一種取向是閱讀已經被改編為電影的小說，由此可以討論究竟是小說本身精彩還是電影更為出色，電影



The Guns of Navarone 在 1961 年曾被改編為電影《六壯士》

是否忠於原著。我則漫無目的地選了好幾本，直至有一天忽然購買了《飄》（Gone with the Wind），誓言要在會考放榜前將它讀完。

前面提到的幾本書，都是小說。事後想來，其實它們有一個共通點——讀者需要有一定的耐性，慢慢進入故事場景、敘事結構、人物關係等等。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沒有捷徑。但正是因為沒有捷徑，讀者才會通過一個「發現」的過程，了解到故事如何峰迴路轉，人物如何出現變化，最終又怎樣走向結局。當然，作者會在沿途為讀者提供線索，給他們提示，解釋為何故事會有那樣的發展、轉折。不過，這需要讀者主動投入，從文字、段落中「發現」故事的內容。這是一個讀者與文本互動的過程，閱讀的時候需要主動投入，不只是理解，而且要求思考。我覺得這種閱讀是立體的，有很多可能性，而不是去尋找期望中的或所謂的標準答案。而當讀者投入文本的時候，想像的空間並沒有界限，他們不需要完全跟隨作者的意思去了解其中的內容，而是可以憑著自己的閱讀、演繹，建構獨有的理解。

閱讀並非「找答案」遊戲

我之所以不喜歡由「工作紙」來輔助（甚至是「領航」）閱讀，皆因這

會將閱讀平面化：閱讀變成了「找答案」遊戲。當期望中的結果是找到回應「工作紙」題目的答案時，閱讀便成為一件任務，最好能夠高效完成，滿足要求。我們會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很快地跳過「不相關」的部分，盡快找到回應問題的答案。使用這種輔助工具的思路，誰能盡快回答題目，就等於誰能把握閱讀材料中的重點。

我明白，「工作紙」的設計並非千篇一律，只要加點心思，可以帶領讀者去思考作者是通過什麼手法、方式來說明主旨，又或者從文章中找到例子，以說明寫作的特色等等。我們不應忘記，得不到適當的輔助，很多學生會不知如何入手，也就難以連貫地讀下去。我對「工作紙」有很多保留，是因為很多時候老師和學生都就只是停在那裏，沒有再回到閱讀過程中，真正發掘出閱讀的樂趣。

與此同時，我們身處的世界正發生急速的變化，令閱讀變得更加直接。理論上，所有科技上的新發明本身都是中性的，要看我們如何應用、接收，才有所謂效果的好或壞。AI 不應該是為書本、論文寫摘要的工具；互聯網、社交媒體上所傳遞的信息也沒有必要一定要「短小精悍」；PPT 投影片應只是輔助演講、報告的工具，而不是一份完整的文章。這些我們都知道的。可是，

現實是大眾的期望改變了：寫了三百個字還未進入正題，就要懷疑這位作者是否詞不達意，表達的技巧是否有點問題。在互聯網、社交媒體上，我們的要求讀者有閱讀三分鐘以上的耐性嗎？學生聽課之後，還要翻教科書、參考書來溫習嗎？PPT 不就是老師的教材嗎？以前的理所當然，不一定繼續理所當然下去。

媒體本身並不是完全中立的，傳遞方式的確會對內容產生作用，不過科技及宏觀環境轉變的背後，更重要的還是態度上的改變。我認為閱讀的平面化、功能化，令很多人開始覺得閱讀的過程本身已不再重要。

今時今日，速成是重點。

提問、探索與想像空間

閱讀與思考是難以分開的。為什麼會有閱讀的動力，乃因為心中有提問，想找答案，也想在閱讀的過程中思考問題。問題的答案不一定在書籍裏面，但在閱讀的過程中，可能會得到啟發，也有可能想到其他問題，邊讀邊間接地反思自己心中的那個疑問，更有可能在這個過程之中改變了聚焦的問題，朝另一個方向去尋找答案。當然，我們也可以沒有特別的原因，就是想拿起一本自己想讀的書去讀一下，享受當中的

樂趣。有時候我們甚至會享受尋找一本適合自己的書籍的過程，到書店閒逛、「打書釘」，隨意地翻一翻，其實也可以是一次與自己內心的對話，問問自己：為甚麼這個問題值得思考？為甚麼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很重要？為何我會對這個題目感興趣？

從某些角度來看，閱讀有它的功能性——例如為自己心中的提問找到答案。我所擔心的問題是，因為讀者太重視實用、功能、效率，閱讀的可能性被大大壓縮了。大家從一開始便想找到那就在眼前的答案，最好可以一二三四逐點列明，不會遺漏。久而久之，如果不是以這種類似「標準答案」的模式來表達和陳述，學生便會抗拒讀下去。他們好像從來沒有想過要閱讀一些自己並不熟悉的主題和內容。一出現這種陌生感，他們便會停下來，有些時候是不知要如何讀下去，更多時候則是認為讀本已超出自己的認知範圍，所以不知如何能夠找到預期的答案。閱讀就此結束。

我在前面提到自己開始自主閱讀和學習，基本上是受到幾本故事書（小說）的影響。每次讀一個新的故事時，我們都需要進入新的背景、敘事、人物關係。如果我們失去耐性，不願意慢慢咀嚼情節的發展、人物關係的建立和改變，根本就不會讀下去。在閱讀小說、故事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培養了閱讀

所需要的耐性和想像。而這份耐性和想像不只適用於閱讀小說、故事，而是可以普遍應用到對其他書籍的閱讀上。

我的工作是社會學研究，社會科學的閱讀——無論是實證研究或者理論的探討——均要求我們願意摸索，進入一個自己本來並不熟悉的想像空間。我們不可能一開始便認識香港的貧窮問題或者美國的種族矛盾，我們也不可能一下子便領悟到權力是怎麼回事，以及國家機器怎樣推動經濟發展，階級如何決定個人在生活中有哪些機會。要明白、掌握一些社會現象和概念，也需要我們慢慢進入，細細咀嚼其中的含義。那不單只是理解，而是關乎想像。沒有讀者的投入，那想像便也不會發生了。

速成時代的挑戰

現在，速度決定了閱讀。長篇固然不合時宜，但短篇的「短」似乎也不斷被重新定義。讀者的注意力愈來愈難留得住，如果不能直接提供他們期望中的答案，均屬多餘。這可能也算是一種閱讀，不過肯定是相當乏味的。